《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明清时期的变化》简介

黄　谷

从明到清，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绅士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渐露头角，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嬗变、保守派和改革派间的斗争等过程中，他们都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明清时期的变化》(哈佛东亚研究会、哈佛——燕京研究所 1989 年 310 页)一书，就集中了南朝鲜学者闵斗基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研究和探讨的成果。

闵斗基教授在南朝鲜汉城国立大学执教多年，曾任亚洲史系主任，专攻中国史，本书六章收集的实际上是他的六篇论文。第一章，"《热河日记》与清代统治的特点"，主要通过一位十八世纪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察，来描述清代社会和政治变化。民族差异、大汉族中心思想和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态度、出版业与中国学者，以及清代的朱熹研究等见闻。第二章，"清代社会中的生员、监生阶层"，作者将视点集中到那些绅士的下层，即生员和监生阶层上，从他们的身分构成、基本特征和社会状况入手，分析了他们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他们的社会能动性、思想和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三章，"重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者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置于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之中，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去考察该口号出现的思想演变过程，并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东方道德、西方技术"的口号作比较，阐述了作者对近代中国这一口号提出的理解和评价。后三章集中讨论了传统的"封建制"与"郡县制"政治思想在清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又怎样为我们当代的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演变的轨迹。在第四章"清代的'封建制'理论"中，主要分析了"公"与"私"的概念在清代是如何演变的，作者认为清代"公"的概念包含了地方自治的离心思想，那是地方绅士们所追求的，也是晚清立宪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作者还解释了清政府企图借立宪之名来行中央集权之实，而最终失败的原因。第五章，"晚清的省咨议局"，则揭示了在清王朝企图支撑它的中央官僚统治过程中，省咨议局是如何认为那些利用封建制思想作为一个演变工具的绅士们反政府活动的主要舞台的。第六章，"苏州—杭州—宁波铁路的大辨论"，描绘了那些关心地方利益的开明绅士在沪杭甬铁路大辨论的风潮中又是怎样与清政府作对的，并高度评价这场辨论是地方绅士发起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收复外国人所攫取的在华特权的民族运动。

通观全书，第一个特点是旁征博引，蒐集丰富。作者利用通晓多种文字的优势，集世界研究之成果，参考和引用了朝、日、汉、英等国文字的材料和论文三百多种，包括报刊、论文、专著和年谱、日记、档案、传记、文集、书信、回忆录等，其中绝大部分是中文的原始材料和论文。如，利用朝鲜学者朴趾源使华日记来讨论十八世纪清代统治的特点，材料真实可靠。另外，作者还大量引用中国学者的文集，书稿，象《明夷待访录》、《亭林文集》、《校邠庐抗议》、《谭嗣同全集》等来探讨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寓论于史，阐微发幽，自成一家。第二个特点是追根溯源、

务求真实。这里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对史料的认真态度。书中所论专题，前人和学者多有论述，但作者仍锲而不舍，在原始材料堆中爬梳整理，排比罗列，力求解悟真谛。另一方面，作者对事件和思想渊源的探讨亦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不轻易附和他人。在讨论清代生员和监生的成分构成时，作者首先就列举张仲礼、瞿同祖、何炳棣等人对绅士阶层的研究成果，然后又通过考察生员和监生参与国家政治的程度、他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对他们自身行为的调查，描述了生员和监生阶层的特殊社会地位，在绅士中他们不被视作是绅士的一个简单阶层，亦不视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在百姓中他们因获有传统特权和共同利益、又与绅士站在一起排斥百姓、也不能列入百姓之列。还如，在探讨"封建制"思想的理论在十九世纪的影响时，作者从秦汉之际围绕"封建制"与"郡县制"是立"公"还是立"私"的讨论开始，沿唐宋而下，直到清代的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朱书与颜元的辨论，以及后来参加辨论的龚健飏、袁枚、刘鸿翱、冯桂芬、杨象济、戴望、俞樾、康有为、梁启超、陈虬、汤寿潜、郑观应、陈炽等，都一一加以评述，脉络清楚，条理连贯，不仅显示出作者求实之学风，而且反映了一位外国学者潜心钻研之苦心。第三个特点是视域宽阔，见解独到，书中的几个专题、均为作者多年悉心研究之体会，视点高，立论新、为不少学者折服。如，在探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时，作者将洋务派与变法派的思想进行解剖，指出该口号的体用关系没有严格的哲学术语的意义，而只是相对地意味着关系的前后与主次，所反映的只是人们如何接受西方事物和西学的态度，并不具有读者们将其在主次意义上视作正式的二分法的意义。作者还将这口号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东方道德、西方技术"的口号作了比较，认为中、日的口号在结构逻辑上是非常相似的，同是强调民族的价值和赞成了解、学习西方知识，但结果却不一样，日本的口号带来了一个成功的全面的制度改革，在这个口号下，日本展开了一场"开放国门"的辨论，并为明治维新铺平了道路，而中国的口号却随着 1898 年变法的失败而流为空谈；日本人在接受西方知识时并不注重去划分什么是西方的和什么是自已的之间关系的界限而直到"五四运动"，中国人还未摆脱怎样划分出一条区别中国的与西方的知识界限。还有，在讨论"封建制"的政治思想时，作者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有关"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辨论，与 1898 年变法运动中有关国会制和地方自治的辨论加以比较，认为顾炎武和黄宗羲所鼓吹的制度改革继续影响着整个清代有关"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功过的辨论。这种关系到传统的"封建制"制度的讨论，是有利于接受西方理论的，顾炎武鼓吹地方自治并不废止传统的统治，黄宗羲号召绅士们参加地方管理要成为制度化，则是作为在郡县制度下阻止由专制君主行使独裁权力的一种方法。此外，作者在对清代绅士阶层的认识、对近代省咨议局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以及有关沪杭甬铁路辨论的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上，都不乏新见。美国学者库恩·菲力浦（孔飞力）和加拿大学者波鲁克·提摩西评论道：读其书，知其人，犹如在异乡遇到了一位伴游者，他走的与你同路，但他具有特殊的睿智和洞察力，他能看到那些你所看不到的事，能悟出那些你所见到而未能悟出的道理。

毫无疑问，该书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对于促进该领域的探讨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有的观点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只要社会基础没有新的变化的话，任何改革就必须依靠绅士阶级来完成。正由于此，他们逐步开始要求社会地位和权力。回顾一下整个清代的改良和变法运动的历史，这种看法是否会被那些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们，特别是中国的广大学者所接受呢？另外，该书由于是由几篇文章组成，如能在结构的安排上注意加强相互间的衔接和连贯的话，则能增强全书的系统性和一致性。还有，在某些标题与内容的统一上亦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